

论简·奥斯丁小说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立场

谭颖沁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63)

[作者简介] 谭颖沁(1972-),女,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摘要] 简·奥斯丁小说以女主人公为内聚焦视点,利用大量的自由间接话语,颠覆了男权叙事传统,建构了女性叙述声音和叙事权威。同时,小说成功地在读者与女主人公之间建立起同情的纽带,使读者认可女主人公的价值判断,从而加强了叙述声音的女性权威。

[关键词] 叙述声音;叙述视角;自由间接话语;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4-0452-05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创始者和领军人物苏珊·S.兰塞指出,女性主义表达“观念”的“声音”实际上受到叙述“形式”的制约和压迫,女性的叙述声音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技巧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社会权力问题,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所^[1](第117页)。由此可见,社会身分和叙述形式是紧密相连的,社会行为特征和文学修辞特点的结合是产生某种声音或文本作者权威的源泉。本文试图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相关理论,以小说的“叙述声音”为切入点,通过对简·奥斯丁作品的分析、解读来考察作为女性作家的简·奥斯丁为表达女性主义立场而采取的叙事策略,探讨她如何利用特定的叙述模式来作用于读者,“合法地”有效地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威,以图藉此影响社会,改造现实。

一、叙述声音的女性权威

兰塞在其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作《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指出,作者型叙述声音这个术语是表示一种“异故事性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者等同于作者,受述者等同于读者自己或读者的历史对应者。本文论述的叙述声音就是基于此意义上的叙述声音。

在奥斯丁出版的6部小说中,《诺桑觉寺》虽是最后问世的,却是最先完成的一部力作。在这部小说中,她采用的是公开的叙述者和外露的作者型叙述声音。《诺桑觉寺》的第一句就采用了一种断然否定的反讽话语来确定文本的写作基调。“凡是在凯塞林·莫兰的幼年时代见过她的人,谁也想不到她命中注定会成为女主角。她的家庭出身,父母的个性,她自己的品貌气质,统统对她不利。”^[2](第1页)小说开篇的这句否定的话语具有双重声音,表面文本是作者对自己笔下非父权传统的女主角的嘲讽,隐含文本却是批判当时男性作家所制定的小说创作常规:女主角必定是气质高雅的,美丽聪慧的“天使”级人物。这种反讽叙事一直持续到小说的第5章,在那里奥斯丁插入了她有名的小说和小说家之辩,“让那些评论家穷极无聊地去咒骂那些洋溢着丰富想象力的作品吧,让他们使用那些目今充斥在报章上的种种陈词滥调去谈论每本新小说吧。我们可不要互相背弃,我们是个受到残害的整体。虽然我们的作品比其他任何文学形式给人提供了更广泛、更真挚的乐趣,但是还没有任何一种作品遭到如此多的诋毁。由于

傲慢、无知或赶时髦的缘故,我们的敌人几乎和我们的读者一样多。有人把《英国史》缩写成百分之九,有人把弥尔顿、蒲伯和普赖尔的几十行诗,《旁观者》的一篇杂文,以及斯特恩的作品里的某一篇,拼凑成一个集子加以出版,诸如此般的才干受到了上千人的称颂;然而人们几乎总是愿意诋毁小说家的才能,贬损小说家的劳动,蔑视那些只以天才、智慧、情趣见长的作品”^[2](第27页)。在这里,奥斯丁毫不留情地谴责了男性文学传统,指出男性文学创作表面上轰轰烈烈,实则尽是些“陈词滥调”,她还公开宣称文学理所当然应该是女性从事的职业,女性小说家应当拧成一股绳来挑战男性文学霸权。这种公然地与男性写作相对抗的姿态,显示了奥斯丁试图颠覆男性文化传统的勇气。在《诺桑觉寺》中,像这样的作为女性叙述者的“我”抒发对女性和文学的看法的评介性议论随处可见,因而小说的女性叙事意识很强烈。

《诺桑觉寺》在出版方面的受挫,促使奥斯丁明智地调整了叙述声音的样式和范围,在形式上另辟蹊径。对任何一位女性作家来说,写小说并寻求出版,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话语权威的追求。与其高扬作者权威遭拒斥,不如学会克制自己的作者权威而使作品得以发表,使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具有权威性。奥斯丁后来创作的5部作品在叙事模式上都表现出对作者型叙事行为的明显克制,而且完全避开了外露的作者型叙述声音。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用或很少用第一人称指自己。“在《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和《劝导》的叙事中,分别只出现过一次,《曼斯菲尔得庄园》只在结尾部分出现了些许的‘我’,而《爱玛》连一次也没有。”^[3](第80页)小说中公开的叙述者转变为隐蔽的叙述者,这种叙述者只陈述故事而不介入其中。诚然,随着外露的作者型叙述声音的减弱,小说的自我叙事意识和作者权威也随之减弱,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委婉含蓄的叙述声音比外露的叙述声音更让人信赖,这是因为后者更容易引起读者的不同看法,引起不同的争议。正如施格米丝·雷蒙·凯南所指出的那样:“叙述者如果过于外露,那么他被完全信赖的可能微乎其微,这是因为他的阐释、评价和归纳并不总是与隐含作者的标准尺度相吻合。”^[3](第80页)奥斯丁是一位喜欢运用头脑的女性,当她在颠覆男性叙事权威的正面战场上受到阻击时,她狡黠地采取了一种迂回的叙事策略。奥斯丁“深谙特定的叙述视角对于呈现叙述者乃至隐含作者的观点、立场,传达独特的社会、人生体验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在运用自己本可轻易拥有与支配的叙述特权时表现得相当谨慎和节制”^[4](第97页)。她对传统的全知视角进行了改造。在全知视角的非聚焦型叙述框架中,奥斯丁构建了一个以虚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为聚焦点的内聚焦型叙述模式,通过这样巧妙的视角转换,她将不具有性别特征的“异故事”叙述者转换成为女性叙述者,她的小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女性叙事文本。在叙事过程中,奥斯丁采用了自由间接话语、反讽、省略、否定、委婉等“间接手法”,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叙述。通过这样的叙述,奥斯丁让叙述者参与到小说人物的思想活动中,引领读者对人物、故事进行观察与全面了解,同时也树立了作者自己对故事的权威知识。

二、女性内聚焦叙述模式的构建

奥斯丁在其小说中均采用了进入人物内心活动,以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为内聚焦点的叙述方式。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小说的前10章呈现为非聚焦型的全知叙述视角,叙述者全方位地关照着事件与人物,我们逐个认识了书中的人物:智慧但怠惰的班纳特先生和他智力匮乏的妻子班纳特太太,温柔美丽的吉英,头脑灵活的伊莉莎白,好心肠的彬格莱和傲慢的达西等等。小说的头几章似乎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渲染吉英和彬格莱的爱情故事,而达西对伊莉莎白的钟情只是偶见端倪。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叙述者对伊莉莎白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在尼日尔斐花园,吉英病愈本应成为焦点的那个晚上,她却被叙述者完全抛在一边,作者尽情地描述伊莉莎白、彬格莱小姐和达西之间的唇枪舌战。从此,小说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从小说中的某一个人物的角度进行叙述的内聚焦型叙述出现在非聚焦型叙述框架中。这时叙述者开始频繁地进入女主人公伊莉莎白的内心世界,以伊莉莎白为叙事焦点,从她的视角去耳闻目睹和见证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的发展,从而拉近了叙述者与伊莉莎白的距离,缩短或完全消除了叙述者与伊莉莎白的阐释、评价、归纳等价值之间的距离,因而大大增强了叙述者的权威。换言之,伊莉莎白的所

思所感成了小说世界判断事物的一个标尺,与此同时,作者将自身的某种价值判断、理想追求寄予在她身上。在传统小说中只能被叙述、被支配的女性第一次被赋予了话语特权。在这里,小说世界的判断标尺掌握在女性手中,男性人物成了被打量、被判断的对象,奥斯丁巧妙地把传统小说的话语权颠倒过来了。而且,当作者将自己与伊莉莎白的距离拉近时,同时也拉近了伊莉莎白与读者的距离。当读者跟随叙述者进入伊莉莎白的内心活动时,就开始了以伊莉莎白为内聚焦视点的阅读、观察和思考活动,从而使读者与伊莉莎白处于近距离交流中。这种近距离的交流左右着读者观察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的立场。当读者随叙述者进入伊莉莎白的内心世界,对其内心活动、动机、忧虑等充分了解后,就会不知不觉地将同情偏向她。当她因受到花花公子韦翰的诱惑而加剧了对男主人公达西的偏见时,读者不但不会嘲笑她一时的愚昧,反而要去谴责韦翰的伪善,责备达西的傲慢,而且会始终觉得她的偏见来得是那么的合情合理。当她拒绝男主人公达西的第一次求婚,读者一方面会钦佩她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尊严的勇气,并因此支持她所作的决定;一方面也会担心她是否将从此错失良缘而跌入痛苦不堪的境地。当她对咖苔琳夫人发出“我自有主张,怎么做会幸福,我就决定怎么做,你管不了,任何像你这样的局外人都管不了”^[5](第 244 页)这样豪迈的爱情宣言时,读者受到她强烈情绪感染,更会与她的爱情观产生共鸣,清楚地认识到她不惧权贵,敢做敢为的高贵品格。这一结果正是叙述者通过进入聚焦人物内心,不断调整与聚焦人物距离的远近来实现的。

不仅《傲慢与偏见》如此,奥斯丁的每一部小说都是站在女性的角度,讲述女性自己的故事。在她的 6 部小说中,《爱玛》是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理智与情感》原名《埃莉诺与玛丽安》,讲述的是两姐妹的故事;《诺桑觉寺》描写了凯塞林·莫兰如何克服幻想,回归现实的经历;《曼斯菲尔得庄园》述说了平民女孩芳妮的遭遇;《劝导》则写了女主人公安妮的爱情命运。每一部作品里,女主人公都是小说的“聚焦人物”,叙述者和读者都是通过女性聚焦人物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的。《劝导》的女主人公安妮无疑是奥斯丁小说中最突出的“聚焦点”,是奥斯丁笔下年龄最大、最成熟、最完美的女主人公——集众多的美德和才干于一身,有着细腻的感受力。在小说开始时,安妮已经 27 岁,而且经历了 8 年的恋爱波折。虽然她在“误导”下与温特沃思分了手,但在逝去的 8 年里,她对他的情意依然如故。其间,她拒绝了默斯格罗夫的求婚,忍受了温特沃思与其他女人的逢场作戏,战胜了堂兄埃利奥特的诱惑。尽管她的内心遭遇着失恋的巨大痛苦,但她并非一味地宣泄或沉溺于个人感情之中。“在她所去过的地方,她总以自己善于体察、疏导和处理感情以及她‘对人性有最透彻的理解’的性格特点成为一个处处受欢迎的不可或缺的角色。”^[6](第 114 页)尤其是在莱姆事件中,安妮更是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当路易莎突然摔伤,男性团体的优秀代表温特沃斯六神无主时,克服惊恐、恢复秩序的任务就由安妮来完成了。毫无疑问,奥斯丁在安妮身上寄托了自己对理想女性的追求——有坚强的自制力和正确的道德观念,尊重别人,了解自己,拥有丰富活跃的感情世界和细腻敏锐的感受力。这样一个人物无疑应当成为可靠的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因而整部小说都是围绕着安妮的耳闻目睹和心理冲动、联想来展开故事情节的。作为叙事的聚焦点,安妮具有穿透力的眼光,可以洞察出事件的内在含义,解读男性人物的动机、反应和欲望。例如,在巴思音乐晚会上,安妮细心观察了温特沃斯的一举一动:刚开始时,“他的脸色变得和悦了,回话时几乎露出了笑容。……他的脸色依然是和悦的,他甚至低头朝凳子望去,仿佛发现有个空位,很想坐下去”^[7](第 134 页)。可当埃利奥特先生对安妮大献殷勤后,安妮发现温特沃斯“拘谨而匆忙地向她告别”,即使安妮一再挽留他,他也断然拒绝,“当即走了出去”^[7](第 134 页)。安妮对此做了一系列的心理分析:“嫉妒埃利奥特先生!这是可以理解的唯一动机。温特沃斯嫉妒她的感情!这在一周之前,甚至三个钟头以前,简直叫她无法相信!一时之间,她心里感到大为得意。可是,她后来的想法可就复杂了。如何打消他的嫉妒心呢?如何让他明白事实真相呢?他们两人都处于特别不利的境地,他如何能了解到她的真实感情呢?”^[7](第 134-135 页)安妮对温特沃思的行为进行仔细观察和深入分析之后得出了正确的判断:他还爱她。于是,她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给对方以“神志表情,言行举止”的不断鼓励,终获爱情。奥斯丁将长期处于边缘和生熟地位的女性推到了前台,安妮是小说中的叙述者,温特沃思

的爱慕和嫉妒都是由安妮的眼光和心理活动表述出来的。男性主人公降格为受述者,这不仅仅意味着对传统男性叙述方式的颠覆,还隐含着批判既存意识形态的意义——解构男权中心主义,张扬女权意识。

三、自由间接话语

众所周知,奥斯丁是极少数为男权社会所认同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在内容上表现为向男性和家庭的回归与屈从,在语言叙述上也偏向男性的理性化色彩,因而这使得不少女性文评家认为奥斯丁是“认可社会现状的”^[8](第353页),其作品表现出的意识形态是对清教主义时代父权文化的归附。然而笔者以为,奥斯丁绝对不是父权文化的追随者,她是一个叛逆者。她小说的叙述者之所以“披上男性话语的外衣,只是为了随后将其剥去,换上女性话语的外衣”^[9](第10页)。在奥斯丁的作品中,“剥去男性话语的外衣”的任务是通过大量自由间接话语的运用来完成的。

奥斯丁利用自由间接话语构建了小说人物意识和作者自我的共谋关系。《傲慢与偏见》在叙述夏绿蒂·卢卡斯接受愚人柯林斯的求婚时,这样写道:“她想了一下,大致满意。柯林斯先生固然既不通情达理,又不讨人喜爱,同他相处实在是件讨厌的事,他对她的爱也一定是空中楼阁,不过她还是要做丈夫。虽然她对于婚姻和夫妇生活,估价都不甚高,可是,结婚到底是她的一贯目标: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总是把婚姻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尽管婚姻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算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5](第87页)。也许读者读到这一段的第一反应是,叙事者只是在仔细地追踪人物的感受和思维,讲述小说人物卢卡斯小姐的感受和思想过程,没有做任何评判。但是如果再仔细看,读者就会发现自由间接话语的使用使得叙事者和小说人物几乎混为一体了。这样,作者的叙事权威和自我意识通过叙述者和人物的双重声音表现出来了。奥斯丁同时借小说人物和叙述者之口对妇女的悲惨命运做了判断性的评价:在父权制社会中,女子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总是把婚姻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试想受过教育的女子也只有结婚这条路可走,那么其他女子的命运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奥斯丁不但通过人物的意识来表达作者自我,而且以人物意识的漂移作为与读者沟通的手段。《爱玛》中描述女主人公爱玛听到她的被保护人哈丽特倾诉对奈特利先生的爱情后的反应时,就运用了大量的自由间接话语,引领读者认识爱玛的思想变化过程。“爱玛蓦地收回了目光,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就这一会工夫,足以让她摸透自己的心思了。像她这样的头脑,一旦起了猜疑,就会很快猜疑下去。她触及了——接受了——承认了整个事实。为什么哈丽特爱上奈特利先生就比爱上弗兰克·邱吉尔糟糕得多呢?为什么哈丽特有了一点希望,说奈特利先生也有意于她,那问题就越发可怕了呢?她脑子里像箭也似的闪过一个念头:奈特利先生不能跟别人结婚,只能跟她爱玛。”^[10](第368页)爱玛的意识轨迹,首先由第三人称叙事者予以间接描述,然而随着叙述渐渐深入其内心,大量的内心独白呈现给了读者,“为什么哈丽特爱上奈特利先生就比爱上弗兰克·邱吉尔糟糕得多呢?为什么哈丽特有了一点希望,说奈特利先生也有意于她,那问题就越发可怕了呢?”叙事者将人物的心路历程以人物自己的声音展示给读者,而不是以叙事者的声音从外部予以描述,无限拉近了读者和小说人物间的距离。这种零距离叙事易于使读者对小说人物产生强烈的同情,认可并接受了小说人物所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奥斯丁正是利用自由间接话语展现人物意识,给读者开辟了零距离接触人物内心世界的机会,从而将读者牢牢地控制住,建构起自己对读者的叙事权威。

另外,奥斯丁还利用自由间接话语较好地表达出其文本讽刺叙事的深层含义。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描述班纳特太太及其女儿们打探彬格莱先生的消息时写道:“她的报道全是好话。据说威廉爵士很喜欢他。他非常年轻,长得特别漂亮,为人又极其谦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打算请一大群客人来参加下次的舞会。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事!喜欢跳舞是谈情说爱的一个步骤;大家都热烈地希望去获得彬格莱先生的那颗心。”^[5](第5页)这段话的前几句是威廉爵士夫人转述威廉爵士对彬格莱先生的看法。最后一句话是叙述者对她们的评论和想法的总结,具有强烈的叙事干预,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叙述者滑

稽模仿的语气。读者能以旁观者的眼光来充分品味人物话语的荒谬和叙述者的反讽语气,并且读出文本的深层含义:女性惟一的事业空间是婚姻,而舞会则是女人掌控自己命运的惟一场所。在奥斯丁的小说中,有关婚姻大事和女性地位的议论,几乎都是通过自由间接话语被深层地置于小说的反讽叙事中。

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之后的小说创作中采用含蓄的叙事模式,正是因为她聪明地意识到在她所处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大张旗鼓地反对男权文化、呼出女性的声音是行不通的。在奥斯丁所生活的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社会上作者的声音长期以来都是男性的,如果作者把自己的声音表述为女性的,就有可能遭到明确的拒斥。在那个时代,只有得到男性主导文化的认可,女作家才可能有生存的机会。因而,为了获得参与“男性权威”的机会,奥斯丁的所有小说都表现出对男性、婚姻、家庭的依赖和尊重。从文本表面看,奥斯丁的确是遵从父权制标准的,但她又在这标准之下对男权中心进行了含蓄而巧妙的消解与反抗。读者在读了她的小说之后,会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奇怪的双重声音或分裂状态,即表面上听到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说话,而长留心间的却是一种女性的呐喊。奥斯丁是在贴近主导话语权威的叙事策略的掩护下,以女主人公为内聚焦视点,利用带有讽刺意味和虚实距离的自由间接话语,在男性目光的虎视眈眈之下,建构了女性叙事声音和女性作者权威。她所运用的自由间接话语技法成了女性写作传统,历来为伍尔夫等女权主义者所称道,是最有效的“女人气质的”叙事手法。

[参 考 文 献]

- [1] 黄必康. 建构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理论 [J]. 国外文学, 2001, (2).
- [2] [英] 简·奥斯丁. 诺桑觉寺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7.
- [3] [美] 苏珊·S. 兰塞. 虚构的权威: 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4] 吴卫华. 试析傲慢与偏见的女性写作立场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0, (3).
- [5] [英] 简·奥斯丁. 傲慢与偏见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 [6] 林文琛. 劝导简论 [J]. 外国文学评论, 2000, (1).
- [7] [英] 简·奥斯丁. 劝导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 [8] 大卫·莫那翰. 简·奥斯丁和妇女地位问题 [C]. 朱虹. 奥斯丁研究.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 [9] 申丹. 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 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 [J]. 国外文学, 2004, (2).
- [10] [英] 简·奥斯丁. 爱玛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何坤翁)

Jane Austin's Works: Authorial Voice & Feminism

TAN Ying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3, Hubei, China)

Biography: TAN Yingqin (1972-), female,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jor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Abstract: Jane Austin adopts authorial voice, observes through the heroine's point of view, and makes use of a large amount of indirect speech to overturn male-oriented discourse. Besides, Austin builds up a bridge of sympathy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heroine so that they could possibly reach an agreement and share the value judgment, which strengthens the female authorial voice.

Key words: Authorial voic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indirect speech; feminism